

## 目 录

- 解放前化隆小学见闻.....牛谦 (1)
- 略谈我县藏传佛教概况.....公保 (8)
- 我在青年军中的所见所闻.....牛浩 (13)
- 瞻念化隆 (诗一首).....王发科 (18)
- 知名人士马步瀛.....马占钧 (19)
- 迎春金琐谈.....李继贤 (23)

化隆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

## 解放前化隆小学教育回顾

(按：撰稿人牛秉世居化隆县城内，解放前曾任化隆第一高级教员、校长、简师教员等职，多年从事我县的教育事业，对我县小学教育发展情况了解较多，故邀他撰写此文，供志于研究我县教育发展的历史情况诸君参考)。

解放前教育总之情况“风气闭塞，教育落后”本县设县于清乾隆九年，原名为“巴燕戎抚番厅，仅设通判一员，在当时政府目为生番之地，谈不上什么教育，直到道光8年(1828)通判夏三功捐制钱一千串被调款银百两，拨荒地若干，在巴燕戎抚厅、扎什巴堡创办两所义学，以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为教材，直至民国二年(1913)改为巴戎县，属西宁道，全县共发展了原西沟(较早)甘都、昂思多、朱家湾、地滩等几处私塾，因师资缺乏，就学者有限，只培养了两名秀才，靳绣春、白××(归乡长白耀西之父)系光绪31年丙午科。两名监生朱果(朱福成之父)赵琳。民国期间，(1914至1928)改私塾为学校，县为高小校，乡村为国民学校，师资除靳绣春、白××外并有马步芳介绍任参谋的李锦春，马如彪、骆秉华，均甘肃多才之士，是为城关教育后辈做出贡献之人。

自1925、26年冯军主力进入西北，积极筹办开封训政学校，甘肃薛笃弼开办训政自治講習学校，以及西宁行政长官林致之倡导、保送，风气大开，仅我县(巴戎)城乡前后深造的有靳克勤、靳克俭、牛涌(后入训政学院)包应昌、马绍武、李文秀、童世贵、刘定邦等入甘肃第一师

校。陈炯、沈文彩等入甘肃训政练习学校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改为巴燕县。始分科设局。呈领开垦荒地。大办学校。马步芳（时任团长）捐款白洋2000元拨寺尔沟、南尔沟土地十八亩。改西关清真学校为同仁学校。县长张振江拨县府后仓院及一庙宇为一高扩建教室、操场。教育局按省规定。各校一律采用部颁教材。改甘都、扎巴为高级小学。新设女初校（设在菩萨庙），改办及新立的初小有昂思多、谢家滩、尔西沟、地滩、工哇滩、上尔什加、李家庄、耶什扎、加哈尔、拉曲滩、黑城子、德恒隆共13校。学生共630名。女生13名。直到1931年。一批一师毕业生先后任教。以及政府之大力倡导、支持。一时平民学校、民众夜校、图书阅览室（设在鼓楼上）相继兴起。可惜为时年半。烟消云散。维持较久的（约八年）是童子军团的成立成长。因省教育厅长张爱松的倡导试办。县长张振江首先响应。1929年自任团长。聘马步芳为付团长。李文秀为教练员。县高小、西关同仁学校成立两个大队一个团。发仿英童子军装、军帽、哑铃等共约80套。于是训练、上课、检查街道、家庭卫生。维持开会秩序、宣传政令、转移社会风气为全省首创。省上于1930年始成立童子军团。见《青海文史资料》四辑。

1931年师长马步芳兼任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长。凡属回族区域学校均划归会属。师资、经费由会统筹。我县聘马应彪担任会长。李锦春为首任校长。郭登荣、宋精庆为教员。

自1928至1935，是化隆教育兴起时期。全县先后新成立县立小学八处，回教教育促进会划归及新开小学共39所。除城关、扎巴、甘都、有经费校址外，其余大部设于清真寺、嘛呢坑、庙宇，仅蔽风雨，旧桌、土墩十分简陋。当时入学，带有强制性，如卡力岗、舍仁、群礼尔、下六族等称为学系，每人念书（雇价高达400元）之怪现象，时有所闻。现将两个教育系统，分列于下：

一、回教教育促进会化隆分会：一度改为委员长制，后改称教育长。经费：共白洋6000元，土地十八亩，舍设学董若干人，干事一人。待遇：（依白元计）两级校长每月五元，办公费二元，初小3.5元，办公费1元，每月每人粮6升（折市90斤），夏季单衣，衬衣各一套，冬季棉衣一套，屋宇每月2元（多由教员自兼）待遇时有变更。这是张生魁任校长，干事时（1942至1947）为例。任过会长的有马应彪、马相龄、委员长 马秉义（1938）干事金玉堂，任教育长的：马明德、马静波（时任简师校长1939年）、张福旺（41年）沈鸿仪（42年）、冷世禄、马进兴、马德彰、马德俊、韩福（47年），西关任过校长的：李锦春、周秉义、金声、柴秀春、冶华亭（1938），此后由教育长兼，鲜鸿恩（41年）、孟希孔（43年）周鼎、祁应春、祁占基（46年）韩福直到解放。

学校由县属划归的有：西关（两级）、耶什扎（系藏族小学因其百户古勒多吉与马步芳私人关系呈准为县属）甘都（两级、系男女合

校较早之一)。扎巴(两级)加舍尔、拉曲滩、黑碱子、德恒隆、昂思多(两级)九校。新成立的有:窑湾、金家庄、三塘、拉木、雄庄、卧力泉、铁力盖、沙尔洞、初麻尔、李什吉、卡什代海、勒庄、特扎多吧、舍仁(两级)群科尔(两级)牙什泉、耶什冲、他家日芒、麻什加、阿什努、牙曲、拉麻、阿藏吾吉、沙连堡共26校、两共36校。热心教育人士有马应彪、马良、古勒多吉、巴洛阿吉等。教学时间最久且有成效的如雷海春、李锦春、包应昌、戴鸿儒、马迎春、冶华亭等。教育长中以沈鸿仪较有作为。

化隆系多民族杂居区域。风气闭塞。迟至青海建省以及抗战军兴。(1937)地方当局为了时代需要。各乡大村设了学校。尤其撒拉族、藏族循于教规。积习难返。重经轻书。在当时实行双轨制强制推行。才打开了局面。消除了阻力;加以会属中学。实行公费。三年五年或保送深造。或任以军佐军官。看到了好处。大开了眼界。促进了撒拉族、藏族教育初步发展。这确是地方人士及教育界人士始料不及之一点贡献。

另一特点是。无论县校乡校。入学上一视同仁。不分畛域。这为促进各族友谊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。

(二)。县立小学:属教育局(民20年改科)局设督学一人。科员一人。县立第一高小:经费白洋4000元。由商会一分生息。设校长一。月薪8元。教员2至3人。月薪7至5元。办公费4元。为本县有121年历史的校。任过教育局(科)长的有刘定邦(学

(一)

监)牛浦(1928)李文绣(1930)包应昌(1936)邓春海(40年)潘泽霖(41年)马维亨(45年)陈世昌(47至49)任过督学的:金玉堂、童世贵、刘诗。任过校长的:靳春(1918)马如彪(1920)骆崇华(1923)牛浦(1926)靳克勤(1930)冯西山(1932)李文绣(1928至1933)沈彦芳(1934)靳克勤(1937)童世贵(1938)包应昌(1939)牛谦(1940)文廷奎(1941)牛谦(1946)孙得奎(1949)靳克宽(1948)解放后改为巴燕镇一校。

斯校历史悠久,为社会输送师资及其他骨干较多,有名的如马绍武(中央政治大学、本省职业、简师校长、教育厅、民政厅长等)刘华(中央政治大学,1942年全国高考第一名、任粮食部督学、大学教授等)冶成荣(南开大学成达师校后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、任省田粮处长财政厅厅长等、现在台湾)朱文明(中大新闻任国大代表、现在台湾)刘希尧(四川边区大学)牛谦(中大附设畜牧卫生学校)刘富(西北农业专科学校)。

女子小学,直到解放仅有20年历史,任过校长的:刘定邦、石伟、石献亭(兰州市)夫妇、童世贵、刘玉素等,深造的:刘玉素(四川边区大学)刘玉素(四川边区大学听课)

直到解放,县属中心学校只有巴燕镇、谢家滩,藏族的:查甫、雄先共四处;初小藏族的有:什大仓、千户、科沿沟、科巴塘、查

主、塔加、日隆、昂咚、德加（汉藏）科却（汉藏）二昂昂（汉藏）汉族的有：李家庄、工哇滩、地滩、及西沟、上昂什加等共17处。中心学校设校长一人、教员二人、初小一人。待遇：每年每人粮食1500至1400斤，初小1300至1200斤，烧柴十月足用，办公费，规定一年30至20元（白洋，折粮或收现金）均按学区摊派。

1936年马步芳视察北山马场返城时，地滩、李家庄众老民迎于途，并言及学校缺房等情，当即各献小麦十石（约合15,000斤）地滩修教室、宿舍中山堂共12间，李家庄亦添修教室数座，如甘都等校，也有此情况，叙不详。

当时三班或四班学生，只有一教师，任务繁重，待遇菲薄，仅足糊口，有时还须开门收柴，按户催学，初小毕业，大多无力升学，少有产者，入县、入省深造者，有数可稽，如谢家滩升入简师的郝生梅、兄弟，杨生枝等十儿人，及西沟之吴兴桂，地滩的沈彦蔚（畜牧专科学校）李长思、沈存德等十儿人，还有部份人无力升学，多入公费的湟中、湟川中学，如靳克让、李长福、杨春景、靳纯矩等十儿人。

从上述看出，我县学风不浓，教育谈不到普及，入中专大学者，仅几家儿人而已，当时无考试、用人制度，一切凭个人努力、机缘，大多满足于高小、中学毕业，明知教师清苦，视为唯一出路；教书一生，老来穷困、潦倒，如石能、靳克勤、包应皇、周洁等大有人在。

又如郭秀春、戴鸿儒、关存义、沈存德等在新社会得到任用或照顾，享受到退职待遇。新旧时代对比，感慨良多。是现代青年所不能体会的。

综上所述，在解放前，撒拉族、回族、藏族人民，重经轻书，半生，只出过一个格西·桑热加措（任省翻译秘书）。几个有名阿訇如巴洛阿訇、尕巴那戎阿訇……<sup>富乡口阿訇</sup>，任重要省级职务者屈指可数。如马绍武、马朴、刘呈德、冶成荣等几个人；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下，不仅格西、阿訇得到重用，旧社会的一些学生、青年经过培养在各条战线发挥了作用，人数遍及于各大小街巷、村庄。从其规模、远景，以前任何时代远不能比拟。但寻根溯源，旧社会之学校机构，从初创、孕育起了破土、培基作用，点滴效益是不可忽视的。

撰 稿：牛 濂

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

### 略谈我县藏传佛教概况

我县现有黄教寺院34处，红教寺院37处，本教寺院3处，呢嘛164处，佛塔7座。

1. 黄教寺院（格鲁派）：现有黄教寺院34处。其中33处是老寺，一处是一九八〇年新建的附寺。本县黄教寺院夏琼寺是黄教创始（母）寺。佛教后弘发起寺丹斗寺是藏王次子玛灭仁布佛教复兴发起寺。这两个寺历史悠久，威望很高，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，过去全县共有45处寺院，现在已经开放了34处，没有复建和有4处。宗教改革前群众自行撤毁的有7处，过去有些三、四处寺院合并成一处寺院，这些合并前的寺院数没有记入现在的寺院总数。全县寺院中创寺最早的是，唐代开始的。这些寺院是丹斗寺、夏琼寺、宝光寺（雄先），色智寺，斗贡巴寺，安达其哈先康寺，东嘎昂（甘都）寺，卡岗寺等。这些寺院都是由红教改为黄教。黄教是从明朝初期创立的新教。这些寺院宗教前有大小活佛208名，现有13名活佛；宗教前有1445户僧舍，现有846户僧舍；宗教前宗教人员3997名，现有宗教人员1478名；宗教前有阿卡（僧侣）2588名，现有1108名；宗教前有完德（僧徒）1201名，现有完德357名，其中18岁以下的有250名。我县藏族信教群众中存在三个教派，即藏传佛教中的黄教、红教以及原始宗教一本教。信仰黄教的群众数量最多，大约占全县藏汉族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全县黄教寺院中，

寺内机构设置最多的是夏琼寺，已开设法相院、密宗院、医学院和密宗行部院、印经院，还如学历史、哲学、时轮、文学、数学、天文和文学艺术等知识。支扎上寺设有法相院，如学其他知识，其余各寺院开设藏语文科、工艺美术科和诵经科等。在我县黄教活佛中具有<sup>高</sup>造诣、学问渊博的有德央、伟史、夏麦、才旦夏茸、夏日东、白日光、玛尼堪保、智华、格谢、多巴（大）和多巴（小）等人，宗改前殿堂最多的是夏琼寺，共有32幢，最高的是三层楼，合计1470间，这些数中不包括六大活佛的宅院和各僧舍，现在，复修了7幢，最高的是二层楼，共有186间，其余各寺院宗改前殿堂在8幢以下，最少的只有2幢，现在复建后，殿堂最多的达2幢。

2. 红教寺院（宁玛派）：在我县建寺最早的有办主哇寺（雄先）、支哈加寺（金源）和科却寺（二塘），现在开放的寺院有37处，在我县藏族信教群众中，信仰红教的人数相当于信仰黄教的藏族总数，这是因为黄教是从红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。在全藏区来说，红教寺创建早在藏王第二十七代拉多朵热平赞时期，据有些史书记载，民间传说，佛经在西藏地区从空中降下，从此，密传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开来，佛教寺院逐年建起，以至行成，这时期大约为北朝中期（公元386——534）。

化隆的寺院，宗改前有宗教人员2059名，现有1401名；宗改前有活佛10名，现有2名；宗改前有阿卡红1519名，现有

1013名；宗教前有红义（教徒）530名，现有红义384；各寺寺庙均以诵经兴为三。并可跳神午等宗教活动仪式。各寺只有一个经堂，规模与黄教寺有所不同，条件较好的寺，每年冬夏各举行一次，宗教仪式活动，其大的诵经活动，夏季30天，冬季10天，而一般寺院，冬夏季各举行一次，每次7天，同时按月历初10和25日各举行一次，每次一天，据查，达现代本区内红教中最大的庙佛是堪达和旦正两位。

3.本教寺院：本教藏语称为完波，也有译为本波较市，这个宗教是藏族地区固有的一种宗教，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。据说它的祖师叫朱饶米沃且，意为最高的坐师，他的生卒年代和事迹不详。据西藏佛教史略中说：“公元七世纪以前来和佛教发生接触的本教有很多困难，因为当时没有文字记载。后期的人对本教的内容都是和佛教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，我们只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，借此看到一些本教的原来面目。此外，国外还发表过《十万白龙》、《色尔尼》等本教经典，这些本教经典实际上都是与佛教发生了接触的变化了的本教的经典’。可以看出，到了后期藏王松赞干布时期，王师洛保善保孔被派遣到印度留学，回国于公元646年后才创造了藏语文字，并从印度梵文经典中将一部分译成藏文经典，经典达到流传高潮时，本教寺院才从藏文佛经中选题摘取而成为本教。从此，本教与佛教接触以至存在于今天。

根据我县实际，信仰本教的群众很少，但历史早于其他教派，大约有一千二百多年。（即唐代上元元年公元761年吐蕃占领邈州）的历史。可是到了三十七代藏王赤松德赞时期，大禁本教，大兴佛教，直到现在本教信仰群众极少，全县只有7个村庄，大约占藏区人数的千分之二。目前，开放的有三个寺院（多西、夏什堂、桑加吾县），过去有两个活佛（班玛、顿中），现有一名活佛（班玛），现在多西村有一位本教活佛叫白旦增，他是四川藏区活佛，大约三岁时，从四川天全转世灵童，认定为四川本教转世活佛，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一直到现在在多西村。我县本教宗教改革前有宗教人员145名，现有131名；宗教改革前有活佛2名，现有一名；宗教改革前有完波99名，现有80名；宗教改革前有完群44名，现有50名。其宗教活动仪式，每年冬夏季各举行一次，每次7天，每月阴历初十举行一次，每次一天。各寺只有一个经堂，规模与红教寺基本相同。

4. 嘛呢康。我县嘛呢康历史最悠久，规模较大的是尖扎嘛呢康（昂思多）。我县二十个<sup>乡</sup>镇，167个村庄建嘛呢康，其中古建的有136个村，新建的31个村，合计有167个村，古建嘛呢康的136个村中，136座嘛呢已经转动；未复建的古建嘛呢康8个村。现在已开放了164个村的嘛呢康，已经转动的有171座。我县建立的嘛呢康（包括藏汉并建的）有五种嘛呢，即：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，颂三世菩萨（桑格达、桑登、旦正），举行仪式和方法，一个嘛

呢康里最多设有三座，但在我县数量极少，一个嘛呢康里设有2座的有一部分，数量不大，数量较多的是一个嘛呢康设有一座嘛呢。其转动方法有三种，即手拉绳子转动，用水推转，用电带转。嘛呢康是从唐代开始建立的，大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

5.佛塔：据传说，我县历史最长的是群科镇谢什玉村——雪什藏（安多却旦让毛）的佛塔，而规模最大的是达卡夏德佛塔。塔的种类大约有8个即菩提、时轮、降服魔鬼、稳定地质等塔。宗改前20个村庄设有37座佛塔，现已复建7座，未能复建的有30座。不包括寺院佛塔。我县建塔大约在600多年前。

撰 稿：公 保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### 我在青年军中所见所闻

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（二次大战）获得基本胜利的前夕，日本帝国主义仍然疯狂地向我国西南的贵州猛攻，不久贵州独山沦陷，大有进犯四川之势。国民党在重庆和中央政府准备迁都兰州，以避其锋，形势十分危急。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，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，蒋介石遂发动了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参军运动。号召在全国范围内，以国民党党员、团员、青年学生、教职员工等报名参军。那时我们祖国的半壁河山，遭日寇蹂躏残害，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、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。抗日救亡运动，呼声迭起，凡有志之士，莫不积极投入抗战事业。因此一声号召，投笔从戎者，风起云涌。我省在一九四四年只八天时间从戎者竟达二千多人。其中湄潭中学、国立师范、西宁中学、乐都中学、湄潭牧校等校学生、教师为王。就连乐都县长王剑平也参了军。还有不少女生。那时化隆县参军的不多，在马上报名参军的只有我和当时在甘都任副乡长的一个湄中县人。这主要是马步芳指示化隆、循化人不许报名，大概留给他已补充部队。但化隆在外县上学或工作的还有八人参了军，如排长<sup>自</sup>人靳正香、潘发荣、李文银、杨遇汉、贾文都、李廷良、范定国等。

马步芳对这次出省参军的知识青年总很关心。主要是为提高他的影响。每人发了黄棉军装、皮帽、大衣、毯子、被子等物；还受了基

本的军训一个月；并听了各厅处、党团机关负责人们所作有关青海政治、经济形势及所谓的“六五中心工作”开展情况等的几次报告；还有我省的青海湖、格尔寺的来历等神话传说的学术报告。这些使我们对于青海的行政措施、家乡风光山川名胜有个较好认识和影响。1945年元月，青海各族各界就在省城隆重举行欢送大会，第二天由团长刘承德率领分乘27辆大卡车东下，至陕西商州后，即编入了206师青年，从此我们就成了正式军人。

206师是一个美式装备的步兵师，其所有士兵都具有较高文化程度。校、营、连、排长都是在军校受过严格训练的青年军官，均有一套政治思想、军事技能的工作方法。不论在军事训练或日常生活中，很难见到粗暴、蛮横态度对待士兵的。这里生活比较民主，经济较为公开，士兵也有能向上级提意见的权利。在一个排内似乎形成了这样一项不成文的传统：排长将多余于班长的工资拿出来，请三个班长吃花生米、水果糖，班长又将多于士兵的薪金招待士兵。连排长每晚要检查士兵铺位，见有被子未盖严或腿手外露的，就得盖好前踢去；若有士兵病了不能上岗上哨，排长或班长立即代替。所以士兵与干部之间关系融洽，亲如手足。

我们营营长是河北人，每每讲话都十分强调“民族至上，国家至上”或“国家第一，民族第一”。成了口头概念化语言。作为一个边陲区来的军人，他怎能忘却日寇侵略者烧、杀、淫、掠家乡所给予的

创痛呢？怎能不发出内心深处的呼唤呢！我连的政治指导员是一位会说能道、讲话艺术水平很高的政工干部。他常寓理论于笑话之中，使士兵听讲气氛活跃，甚至哈哈大笑。他经常讲解团结抗日之道理，并分析国内、国际形势，同时也谈论晋区人民生活情况，有时还夹评时局得失。他那丰富多采地立论，幽默诙谐的话，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教育。在旧军队中能做到这点确实是很不容易的。

在我们初入晋时，规定凡参军青年都得填表入三青团或国民党。像与我一块的士兵晏振春（乐县人）入了三次团（学校一次，投军一次、入晋又一次），还规定：你们是知识青年远征军，不但有知识，且在政治上也得用“三民主义”武装起来。所以每个士兵过去是否入党入团，这次就稀里糊涂都填了表。师部规定，凡206师官兵买日用品、吃饭一律给予优待，就是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，结果一些坏分子上街买东西，下饭馆只给半饭，甚至拿了吃了就开路，连分文不付，使得一些小商贩简直无法经营；还规定乘船乘车免费，看戏看电影免费，因此沿途拦车、拦车者常有，看戏看电影，收票人不敢阻拦，任其出入，还得恭恭敬敬，礼让相待，甚至连宪兵也不敢怎么样。曾有一次士兵与宪兵发生争执相殴，结果有相当数目的士兵持枪围攻宪兵营。所以群众称青年军为四大害之一（军官总队、伤兵残、国大代表、青年军）。有些士兵有意闹事，经常在一夜之间将许多不堪入目的下流、诽谤攻击言词的纸条儿，贴满师长方先觉办公室门口、墙壁上，惹得

方师长常常暴跳如雷。好像一头激怒了的野兽。要吃人的样子。怪怕人。最后换了苗力师长，诬蔑他的小条子也是不断发出。使他闪闪发光如少将金星却增添了不少暗色。所以蒋介石召见第二次青年军时一再强调，军队要绝对服从，不能实行民主。在某种意义上讲此话不无道理的。

全师所有人员来往信件、包裹都得进行检查，认为有疑点，来件见不到，去的发不出。统统扣压。有一次我所在的这个团在野地里集合（远离农村）枪决了一名士兵，宣布罪名是偷窃9支枪械，联络外界去设解放区。谁知这是事实？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，无非是统治者害怕士兵投向人民，是他们恐惧心理的一种变相暴露罢了。

一九四五年底汉中城防由青年军616团接任，褒城城防由618团接防。我们驻守铁桥，检查过往违禁物品（枪支、弹药、烟土、白洋以及药品器械），怕这些物品运入解放区。如查出除没收外，犯者交由军法处审查，以后犯者命运如何，就不得而知。

一九四六年师里特加强了对我们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。由胡宗南的七分校派大批军事教官，什么制式教练，野外教练，班攻击，排攻击，连攻击，加上什么“一个主义、一个领袖”的法西斯思想灌输，搞得士兵们精疲力竭，迷迷糊糊。不久蒋介石随同军事顾问柯德迈将军及军政要人来汉中检阅206师，将检阅情况由美国新闻机构拍成电影记录片。原计划准备补充好装备后配合207师，开赴湖北老河口、襄、樊一线参加抗日。却在八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我们的抗日目的没有达到。

(十六)